·书评·

樊光春新著《西北道教史》评析

金　权

中国西北地区是指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和内蒙古六省、自治区范围内的内陆河流域和黄河流域，环境复杂多样、气候敏感多变，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深受自然环境及其演变情况的影响。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人类宗教文化现象，在西北大地上产生发展了几千年。“地理条件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是古今中外的史学家、思想家都十分关注的问题。”[①]对于道教学术研究工作来说，西北地区道教的发展历史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道教尊奉的始祖黄帝长期活动于长安—终南山一带，道教史上的很多重要事件和人物，都发生和活动在西北，道教的一些主要宗派也是在西北境内形成。国际著名道教学者卿希泰先生曾指出：“开展地方道教史的研究……尚待有计划地、系统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才能推动道教史的研究更上新台阶。”[②]但很久以来，学术界还没有一部全面反映西北道教的发展历史、演变过程和状况的著作问世。樊光春先生新近出版的专著《西北道教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版），终于填补了西北地区区域道教史的学术盲点。

作者樊光春是陕西紫阳县人，早期从事地方志编纂及其理论研究活动，主编《紫阳县志》，多年来曾先后参与渭南、户县、白水、神木等县志审定，并主审延长、汉阴等多地的县志。在转入宗教研究后，主攻道教养生学和陕西道教史的研究，相继撰著了《陕南小武当：凤凰山擂鼓台》、《长安·终南山道教史略》、《陕西道教两千年》、《长安道教与道观》等4部道教学术专著，合著《丘处机与龙门洞》、《中国道教宫观文化》、《大慈恩寺》等，并发表道教研究的学术论文数十篇，可谓对西北道教历史素有专攻。这部《西北道教史》，是樊先生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资助课题《西北地区道教历史与现状研究》的结题成果，全书8卷29章，乃作者十余年来持续不断进行艰苦的田野考察，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西北道教历史进行系统研究的心得与结晶。

纵观全书，作者在全面稽考西北道教的文献材料基础上，娴熟地运用传统史学考证、宗教学、金石学、人类学等研究方法，对西北道教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详细的梳理，运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得出了很多具有说服力的新观点。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传统史学与宗教地理学相结合的学术架构

学科之间的交叉和渗透，近年来在学术研究中被广为提倡，这为学科或专业跨上一个新台阶、进入一个新的研究视点、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不少有识之士已着手这方面的探索，樊光春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他凭借自身的知识结构，多年修订地方志的研究基础和敏锐的学术目光，将传统史学和宗教地理学的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为道教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宗教地理学是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旨在揭示历史时期宗教文化要素在某地区的空间组合和地域分异，阐述总结文化区域分布的历史成因。樊先生采取宗教地理学和传统史学相结合的方法，搭建起这部著作缜密的学术架构。本书卷一共分5章，总体介绍西北道教的历史地理背景。道教的建筑群落，是历代出家道众的修道场所和道教信仰者的朝圣之地，是道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对道教建筑的研究是道教研究的重要基础和组成部分，而大部分的道教建筑都分布在文献典籍记载的道教名山和洞天福地当中，故本卷首先对实体和文献中的道教仙山和洞天福地资料进行了稽考和整理，并依据地方文献资料，结合道教文献，对道教典籍《天地宫府图》和《洞天福

地岳渎名山记》中记载不详和有相互抵牾的西城山和西玄山两处洞府进行了重新的定位和描述，为下一步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历史地理学方面的基础。卷二早期西北道教，主要论述道教在西北地区的起源问题。作者参照宗教学的构成要素横向形成文章的架构，从宗教仪式的起源、宗教组织、宗教思想等几个方面对隋唐以前的道教从产生萌芽到正式形成的过程进行了梳理。卷二到卷六是按照历史发展顺序对西北道教的发展兴衰过程进行详细的论述，也是本书的重点所在。卷七对西北地区的道经和金石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在上述章节的撰述中，作者始终抓住两条主线，一是横向的道教建筑群落的地理分布，一是纵向的历史发展轨迹，在两条主线的纵横交错中，把道教的历史事件、宗派人物、典籍文献、宫观祖庭等要素依次展开，层层递进，条理清晰，逻辑严谨，将西北道教的发展演变历史和独具的西北地方风格鲜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显示出作者深厚的驾驭材料的能力和道教学术研究的深厚功底。

二、重视金石文献的利用

力求全面占有史料，是这部作品的突出特点。傅斯年先生曾经说过，“史学就是史料学”，虽然这句话不无偏激之处，曾引来一些人的诟病，但不可否认的是，全面详实的史料对于史学研究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在充分的史料支持下得到的论点，才能经得起推敲和岁月的考验。

作者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对西北道教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检索研究，其中著作类 54 种，论文达 534 篇，并按早期道教、道教历史、道教经典、神仙信仰等 16 类进行分类整理，列于附录 2 当中，可谓穷尽了关于西北道教的所有相关学术资料，体现了作者扎实的学风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在全面占有史料的同时，作者更注重金石文献的稽考和应用。金石学是宋代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史学，以考校金石文献，结合史籍史料研究为特征。史学界前辈陈垣即以最擅长利用金石材料著称，他充分发掘金石文字证信的特征，以之考史，借其明事，以非凡的识见，时创新见。但因为金石材料大多散落各地，收集整理十分困难，不少学人视之为畏途。樊光春先生不畏其难，通过多年艰苦的检索和田野考察，对西北地区道教的金石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按今人已著录、前人已著录、未著录三类归纳。其中作者新发现，未见著录的有 190 件，占总数的 16.1%，可见作者着力之多，用功之巨，这种勤勉务实的学风确实令人钦佩。如此辛苦耕耘也给作者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依据这些金石文献，作者在证明重大历史事件，梳理宗派传承和印证事实方面都取得了新的学术成果。如通过在秦岭北麓山谷中新发现的《玄都坛歌寄元逸人》摩崖石刻，结合地方志文献，对陈垣《道家金石略》中所载《会仙左坛题字》中的会仙左坛位置进行了考证，基本推定玄都坛即是历史文献中没有明确地理位置记载的会仙左坛。

三、突出的田野调查风格

回顾中国道教史的学术发展历程，从 1937 年傅勤家的《中国道教史》出版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期间著作很多，但以往的道教史研究，基本上都是遵循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依靠经典考证，在文献中搜寻道教历史的发展轨迹。“历史的文献资料虽然重要，但涉及的范围和数量究竟有限，单凭这些不完全的文字记载，企图恢复过去的地理面貌，显然是不够的。实际的情况是若干历史地理问题，尽管不见于文字的记载，但在实地考察中仍然会被发现，并能求得解决。”[③] 作者十几年间进行了大量扎实的田野考察工作，具体过程虽然没有形诸笔端，但从书中随手即可拈来的关于道观、碑文、民间道教活动等方面的田野调查资料，可以想见作者在田野方面所下功夫之深。这些田野调查结果，成为了作者的重要学术基础，随举两例：

通过田野调查，在宝鸡一小学校内，原为磻溪宫遗址发现的元大德六年刻立的道德经经幢，是目前西北唯一发现的以石幢形式刻制的道德经石刻，从该碑刻的行文中断定是全真道的碑铭，作者以实物来证明事实，说明全真道受到佛教宣传方式的启发和对根本经典的重视，结论令人信服，难以辩驳。又如，作者稽考唐永贞元年墓志《唐故九华观静□师藏形记》，碑文中透露出：一是玉真公主曾经婚嫁，并育有两子，而查阅其他所有相关文献时，都没有玉真公主婚嫁的记录；二是上元元年宦官李辅国离间肃宗同玄宗的关系，诬陷高力士、玉真公主等人，导致玄宗被软禁，玉真公主被遣送回玉真观，高力士被流放，

这在两唐书有记录。而此墓志称，玉真公主之子也“得罪，流窜遐荒，茂年倾逝，终于南土”。依靠这个田野考察的结果，不仅可以修补玉真公主生平，也可以补充唐史的缺漏。诸如此类的学术成果，著作中还有很多。

田野调查的方法源自于人类学研究，除了重视田野实地考察外，人类学还很重视用量化分类的方法，使用统计数据来描述历史的发展趋势。作者在书中也娴熟地应用了这个科学的研究方法。比如在整理道观材料方面，作者依据历代的地方志、文献等记载，查阅了大量的地方志、碑文石刻材料，对文献数据采取了科学的统计方法，按照历史发展顺序，对西北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道观名称、数量进行了梳理，得出了定量的数据，并绘制了各个时期的道观分布图。通过这些数据的直接对比，可以直观地展现道教活动场所的历史发展变化情况。对比唐以前和唐代的道观分布表、分布示意图可以看出：唐朝之前，道教庙观主要集中在长安一带，数量也比较少，而到了唐代，长安地区的道观数量增加近三倍，同时覆盖面大幅度扩大。道观数量在唐代的快速增长，尤其是在帝王建都的长安一带，说明唐朝统治者对道教的支持，同时也表明了道教发展和政治经济发展情况之间的密切关系。

四、出新的学术观点

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在谈到治史方法时说过：“最主要的是材料丰富，论断平允，踏踏实实，不发空论”，论证要“步步谨严，如做数学，无一步虚浮”，“不过精审充实只是有价值论著的基本条件，……至于欲其论著达到更高境界，则当在‘充实’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第一要有见解有识力，工作成果要显出有魄力，能见人所不能见，言人所不能言，或言人所不敢言；而同时须兼顾最基本条件——精审充实”，“第二要工作规模恢宏、组织严密，且有创获”④。樊光春先生的著作可以说是对上述论述的印证，作者正是在丰富的材料基础上，经过严密论证，得出了很多创新的学术观点，下面略举几例。

作者将西北道教的发展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原始道教阶段，战国至秦代，黄老之学与上古神话相结合，形成道教早期的神仙信仰；民间道教，起始于民间黄老道，作者考辨认为应早于东汉时期；义理道教，起始于楼观道，道教进入发展的鼎盛时期；宫观道教，始于五代至北宋，以内丹学的兴起和传播为核心。作者对五斗米道在汉中的兴盛提出了宗教地理学方面的缘由，认为汉中地区位于汉水上游，接近政治文化中心又被崇山峻岭包围，相对封闭；其次，汉水上游地区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周秦文化、荆楚文化与巴蜀文化的融合交流地区，巫风盛行，正是这种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使五斗米道如鱼得水，张鲁能雄踞汉中达 30 年之久。

又如，作者通过对明代以后西北五省区的道教分布、信徒数量、教派变迁进行广泛的田野调查和数据统计分析，否定了明清以后道教衰落的传统观点。作者认为明清时期西北道教的影响较元代为广，道观的分布达到青海、宁夏和新疆境内，南方的正一道也传入西北，以宫观为道场或散居民间从事道教法事。与道教信仰有关的民间祭祀小庙大大增加，出现了道教民俗化倾向，而道教融入社会生活的主要切入点为城隍信仰和庙会。

总体看来，樊光春先生的这部凝聚心血的力作，不仅填补了西北区域道教史研究的学术空白，在西北道教历史研究方面也多有创新，体现了尊重史实、勤勉探索的学风。著作为我们研究道教历史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同时因其收罗广博、考证严密的资料，亦可作为后来的西北宗教研究者的案头书籍。

（作者为厦门大学哲学系宗教学专业博士生）

（责任编辑：首之）

---

①白寿彝：《中国通史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

②卿希泰：《道教研究百年的回顾与展望》，《四川大学学报》2006 年第 4 期。

③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年，第 9 页。

④严耕望：《治史三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61－62 页。